

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章 奇

伴随着贸易、金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在欧洲货币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下,是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摆在亚洲国家决策者案头的紧要问题。目前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各种讨论大多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方案的成本——收益的对比判断各种方案的优劣,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项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不仅涉及绝对收益——成本的比较,也是各个国家内外部政治、经济集团的博弈和利益分配结果。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南)亚地区,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异常集中的地区。该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均衡发展,正导致该地区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影响着地区政治、经济权力重新分配以及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国际形势的这种剧烈变动,既意味着新机遇的不断诞生,也意味着地缘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不断增长。这种瞬息即变的国际环境,既有可能催生新的制度安排(需求诱导),也有可能致新制度安排因为囚徒困境而胎死腹中(供给失败)。

换言之,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例如潜在的亚洲金融合作方案),不仅仅取决于该方案所能带来的总体政治、经济福利的增加,也取决于该方案可能会带来的新增政治、经济福利在各国内外部政治、经济集团间的分配情况。前者涉及绝对利益的增减,后者则涉及利益的具体分配。那些仅仅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但因为政治上分歧巨大而失败的案例不计其数。显然,一项新的国际制度安排最终能否得到认可并建立起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经济问题。

本文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合作所持态度,以及在其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应采取的对策,以期为未来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框架和依据。

我们将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几个有影响的国际金融合作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结合对当前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背景以及进展的分析,总结出国际金融制度形成的历史经验;其次,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归纳出金融合作的规律性;最后,具体分析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根本利益及其所处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所应把握的原则,以及在短中长期所应采取的基本对策。

一、金融合作的历史溯源

1、布雷顿森林体系

准确地说,以固定汇率制度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第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由于种种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但包括 IMF 在内的其主要组成机构却依然得以保留并发挥作用至今。虽然从实际发挥作用(1958 年)到崩溃(1973 年)只有十余年期间,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堪称二战以来第一个国际金融合作制度的典范。

布雷顿森体体系的建立可谓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结果之一就是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二战刚结束时,美国的产出占全球产出水平的 40%,黄金储备更占全球黄金储备的 2/3。再加上完整无损的工业以及遥遥领先的军事、技术优势,使美国无可争议地以西方世界领袖的身份建立新的经济新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主要致力于稳定汇率,促进平等贸易关系,迅速重建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并使穷国恢复发展。其中的核心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第二,其他(IMF)会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按照美国的设想,这样一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将会给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带来好处:第一,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由于美元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使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征收巨额铸币税,理论上可以通过无限货币发行为美国的储蓄缺口进行融资,同时相对于其它国家,保证了美国国内政策的灵活性。这样一来,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与此同时,由于该体系消除了货币波动,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贸易和投资,恢复各国的购买力和加速经济复兴,刺激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从而达到一举双得的目的。

美国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义务,一是美国是唯一准备应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请求将自己的货币兑换成黄金的国家,即必须保持美国的黄金可兑换。这也是导致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堪重负并崩溃的直接因素;另外,为了启动该体系,美国除了成为 IMF 的最大出资国外,还必须向西方国家提供巨额资金援助,以加速后者的经济复兴过程。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谈判中,美国代表怀特曾经设想由美国出资建立起国际储备的金额只需

50 亿美元，但实际出资金额远远超出了怀特的估计。例如启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由美国向加拿大和英国提供 37.5 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另外就是为创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注入巨资，为此美国承诺在连续两到三年的时间里每年提供相当于美国 GNP2% 的援助(按 90 年代初的价格计算为每年 1000 亿美元左右)。另外，向另一个盟国日本以及其它次要盟国所提供的援助也是不计其数。

即使必须承担高额的成本，但美国在权衡新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利弊后还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尽快发挥实际作用(沃尔克、行天丰雄，1996)。事实上，该体系在成立后的 10 多年内运转稳定并发挥了令人满意的作用：世界贸易额迅速上升，而欧洲和日本也很快恢复并超过了二战前的最高水平，不仅如此，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在 50-60 年代末大多数时间内都大大超过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大国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导致二战刚结束时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 1955 年，按市场名义汇率计算，日本、法国和德国 GDP 占美国 GDP 的比重分别为 6%、12% 和 11%，到 1970 年则分别为 20%、14% 和 18%。

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相对变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即“特里芬难题”益发凸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依赖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只要人们相信持有美元比持有黄金更好，人们就愿意持有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就会运转正常。反之则出现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向世界供给美元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经常项目的赤字，然而该赤字越大，对美元的信心越可能动摇。在二战刚结束时，美国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使世界对美元充满信心，并且美国并无经常账户赤字之虞。但到 60 年代，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产出的增长，还是在保持价格稳定等方面的表现均大大优于美国，这样一来，当 1965 年美国第一次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且规模不断扩大之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也开始承受越来越严峻的考验；第二，伴随着与美国经济的相对差距不断缩小，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对美国独自支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满也越来越明显。随着越战的升级，1965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将这种不满公开化，他抱怨“美元体系”给美国提供了“过度特权”，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全世界为自己筹措资金，使自己的国际收支逆差不受限制地用美元结清。在联邦德国，虽然作为二战的战败国而不像法国那样咄咄逼人，但也表示德国由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主权，而导致本国正遭受从美国进口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从而表达了要求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愿望。而在美国，由于越战的挫折以及欧洲、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使得美国当局对独自承担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稳定的义务也怨声载道。显然，在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大变化的条件下，一种严重依赖一国的国际体系的不

稳定性也越来越大。

政治人物的表态使得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大跌，美元贬值的压力不断升高，而主要欧洲国家拒绝和美元贬值进行联动。终于在 1973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不再承担黄金自由兑换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史是考察国际金融合作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好的案例。该体系在其创立时完全符合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特征和需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给主要参与国均带来了好处：在一个汇率稳定的国际环境下，工业国家间的贸易额实际年均增长 6%，而经济增长率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例如美国在 50、60 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6.6%。但对于其它工业国家而言，美国的市场开放以及它所提供的集体安全远比它们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得到的要更加重要，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历史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利益和责任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所带来的各国间的矛盾随着欧洲、日本经济力量的恢复而日益尖锐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2、欧洲货币体系

在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欧洲国家痛定思痛，普遍认为惟有建立起制度化的合作机制，才有可能使欧洲国家在共同繁荣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避免重蹈两次大战的覆辙。欧洲的和解与创建符合战后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此美国规定通过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资金要以欧洲各国的合作为前提才能获得，这客观上加速了欧洲一体化的速度和进程。继 1948 年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的前身）和“欧洲支付同盟”之后，1950 年又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该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成为法德和解的经济基础，另外，欧盟的许多组织机构的前身也可以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但是，直到 1969 年才在沃纳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推动货币一体化，最终实现固定汇率和共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所以欧洲货币一体化直到此时才被提上议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货币一体化是欧洲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在客观条件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货币一体化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第二，到 60 年代后期，由于美欧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对美元霸权的反对也日益明显，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两国认为对抗美元霸权的最佳途径就是加快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第三，到 60 年代末，欧洲经济力量的分布格局已经基本稳定。从 1971—1998 年，法德两国的 GDP 占欧洲货币联盟国家 GDP 总和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56% 左右，其经济实力在货币联盟成员国中稳居支配地位。

正如二战刚结束时美国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法德两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主地位同样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支柱。正是这种稳定的经济格局,使得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原有的利益分配关系而不致引发冲突。

70年代末在法德两国的倡导下,欧洲货币体系与欧洲汇率体制得以建立。除英国外,所有欧洲联盟国家均加入了欧洲汇率体制。在汇率体制下,每一种货币的汇率都在一个带状区间内按照各种两种货币兑换的中心汇率上下波动(最初区间为 $\pm 2.5\%$)。一旦某种货币的汇率达到区间的边界,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就会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显然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

欧洲汇率体制在90年代初因为各种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无法完成欧洲货币联盟的主要目标,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并未就此中断。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其中规定了向经济与货币联盟过渡的精确程序,成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根据《马约》,1998年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1999年正式启动欧元,2002年欧洲货币联盟11个成员国的本国货币全部终止流通而由欧元取代,从而完成了欧洲货币一体化。

在法德两国经济力量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欧洲货币一体化仍然花了近50多年的时间,除了各国经济结构存在差异外,对欧洲货币一体化中利益分配的政治分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首先,欧洲央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这实际上反映了德国的意见,但欧洲各国文化、经济条件差异巨大,是否应该为了维持物价稳定而以放弃其它目标为代价并把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全部移交给欧洲央行在政治上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短时间内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其次,即使在核心国家之间,也会由于政治经济实力发展的不均衡而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例如,鉴于德国经济在该区域内所占的主导地位,德国成为欧洲汇率体制下的支配国家,汇率体制因此也被看作是德国马克区。这意味着德国德中央银行开始主导该体制下成员国的货币政策。这引起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疑虑。由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必须争取到法国的支持,因此德国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让步,例如在欧洲央行的决策机制设计上,并不是根据经济力量的相对大小分配决策权,而是根据董事会“一人一票”的原则进行投票。这样,在欧洲历史上拥有更多传统盟友的法国就可以对欧洲央行的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力。在欧洲央行行长的任命上,法德两国也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执。而英国则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上更是态度暧昧,这与英国长期坚持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外交思维是分不开的。

尽管分歧重重,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这一大方向上法德两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的——两国均需要更紧密的合作来获得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更高地位。更关键的是,尽管德国拥有经济上的霸权,但由于是二战的战败国,其政治上的影响力受到限制,必须在重大问题上得到法国支持;而法国则希望通过法德联合主导欧洲内部事务,并以此作为在国际上拥有更大发

言权的筹码。在法德两国任何一方均不具备完全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联合与合作则成为最佳策略。而法德一旦联合，包括货币一体化在内的欧洲一体化也就大局已定。

欧元诞生至今已经将近 2 年有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法德两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力量对比不发生大的变化，且在联合主导欧洲事务以应对美国霸权上仍然意见一致，那么欧元的运行仍会大致平稳。否则，欧元乃至欧洲一体化形势出现逆转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金融合作中的政治经济

从对上世纪两个影响最大的国际金融合作案例的历史回顾可以以下结论：

第一，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第二，要使参与国相互之间在政治上达成一致，就参与国内部而言，主张达成一致的利益集团的博弈会成为主流意见，例如美国国内精英对建立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法德两国精英就法德和解与共享欧洲主导权等关键性问题能够达成一致。就参与国之间而言，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主要参与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应在整个体系内占据支配地位。要么一个主要国家在其中享有霸权地位(如二战刚结束时的美国)，要么主要国家之间的联合实力占垄断地位(例如法德两国联合实力在欧洲货币联盟之中所占的地位)。这种力量对比能够保证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得以按照主导者的意志建立起来；(2)其经济、经济实力的对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换言之，原有的主导性力量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会受新力量的挑战，从而得以使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不致受到新力量崛起的威胁，从而保持整个体系的稳定性。美国自二战后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直到 60 年代三驾马车的格局出现后才第一次受到威胁，尽管如此，对原有体系下利益分配格局的不满使得欧洲国家拒绝与美国协调行动，保证原有美元—黄金平价关系的稳定，从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失败。对于欧洲货币一体化则正好相反，法德两国在占据欧洲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后开始正式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由于政治力量对比在数十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发生变化，使得欧洲货币一体化终于在 2002 年修成正果，发行了欧元并进行流通。

这种力量对比与制度稳定之间的关系，其大致思路与政治学中的霸权周期理论相似。该理论认为，所谓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例如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40年代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沃勒斯坦(1998)认为，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就是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和规则强加于他国。但是，维持这种霸权需要付出代价，一旦这种代价超过霸权所带来的利益，霸权国家的净收益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新的挑战力量就会产生，对原霸主形成威胁进而取而代之，从而催生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一过程中甚至有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

和霸权周期论不同的是，在霸权周期论中，霸权国家为维护霸权的成本超过霸权给霸权国家所带来的收益是霸权国家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衰落的内在原因。但在我们的分析中，霸权国家的相对衰落更多的是新兴国家内在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经济理论证明，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后发国家将因为资本—劳动边际回报更高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赶上先进国家。目前有资格构成美国竞争对手的，均强调市场规律和自由竞争。这种并非偶然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力量对比的变化更多地来自对内在经济规律的遵循，而不仅仅是取决于国际秩序的利益——成本对比。实际上，国际秩序本来就是霸权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认为它会带来霸权国家的衰落是不合逻辑的；(2)正因为新兴国家主要通过自身力量追赶霸权国家并改变了力量对比，才有资格对现存利益分配格局表示不满，才会有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动机和动力，以争取新的经济秩序下有利于己的利益分配格局；(3)新兴国家挑战霸权国家的方式和方法(即新秩序挑战旧秩序的方式和方法)，以及霸权国家对此的反应，将最终决定新旧国际秩序更迭的方式及成功与否。换言之，挑战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有可能使得所谓的“和平崛起”成为可能，而不再只能通过战争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显然，如果一项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如果在成立之初弹性较小，仅仅考虑霸权国家的利益，那么如果该体系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霸权国家的变化，原有制度安排将会因为新兴力量的崛起而变得不稳定甚至无以为继。换言之，一项制度安排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从根本上来讲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该体系下是否存在霸权国家(联盟)；二是该体系下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是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本质变化；三是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条件下，原体系是否有足够弹性考虑并反映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在于原有霸权国家力量的相对衰弱且无法兼顾后来居上者的利益；而欧洲货币一体化迄今为止相对成功的关键则在于法德轴心的牢固以及该轴心经济实力一直在欧洲联盟中处于支配性地位。我们在分析亚洲金融合作以及中国对此的态度和作用时，亚洲地缘经济、政治力量的动态变化将

成为我们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以及划分长中短期的基本标志。

另外，考察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同样必须重视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毕竟，目前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基本构成单位仍然是各主权国家。因此，首先，各主权国家将会在加入某国际经济协定之前权衡综合利弊，包括主权让渡、保留文化传统、发挥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其次，主权国家国内利益将通过国内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实力对比和相互博弈反映出来。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益集团的能力不仅仅表现在人数和经济实力上，还表现为它们的组织和谈判能力。如果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鉴于国际体系对它们的影响及其程度均有所不同，它们对参加国际体系的态度可能有异，这种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德两国最近在其预算赤字方面的举动。按照欧洲货币联盟《稳定与经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成员国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不能超过 3%。但德国的预算赤字在去年达到了 3.5%，估计今年将达到 3.8%。而估计法国的预算赤字占 GDP 比例在去年则超过了 4%。而估计它们在今年将会继续无法达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相关规定。法德两国作为欧盟的核心国家带头违反制度规定，而负责裁定的欧盟理事会则对此态度暧昧，给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定性投下了一丝阴影。其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法德两国增长率偏低，失业率升高，通货紧缩的威胁上升，国内要求增加政府开支以扩大有效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强大的政治压力导致两国选择以国内利益为优先考虑目的。

总之，考察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将金融合作的成本收益以及利益分配统筹考察，以分析金融合作的可行性与稳定性，同时，鉴于国内政治经济是各主权国家决定是否加入金融合作的基本出发点，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重点从不同层次金融合作的可行性、稳定性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考察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的关系。

三、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

虽然目前亚洲金融合作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框架，但许多国家的官方和学术界(尤其是日本)对亚洲金融合作均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首先是日本在 1998 年提议由亚洲国家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当亚洲出现危机时，由亚洲货币基金组织首先进行救援。这一方案虽然一经提出便夭折，但却将亚洲金融合作的议题提上了日程。接着在 2001 年，5 月亚行年会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同行意见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加强东亚的金融合作。与会者一致同意加强政策对话和区域合作，包括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建立自

助和支持机制、促进国际金融改革。同期东盟 10+3 会议上，各国财政部长在泰国达成清迈协议，在双边货币互换以及建立货币风险早期预警系统等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在亚洲金融合作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亚洲金融合作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亚洲各国萌生了加强金融合作，维护金融稳定性的念头；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的要求。时至今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标志，本地区的经济、贸易一体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区域内的贸易额成为本地区贸易的最大驱动力。经济联系的进一步深化对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加强也提出了要求。这和欧洲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的联系是一致的；

三、本地区政治经济力量与地区民族主义的崛起。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是近 20 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再加上本地区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因而经济的复兴很容易伴随着民族主义的苏醒，并进而兴起挑战和改变世界现存经济秩序的冲动。尽管动机各有不同，但加强金融合作却是挑战现存世界经济金融秩序的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正如我们在考察国际金融合作的历史案例时所指出的那样，考察亚洲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就不能不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变化及其对亚洲未来新秩序的影响。

1、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背景

1) 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就是一超多强。美国在冷战、海湾—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中接连获胜，并结合 90 年代其“新经济”的推动，已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欧盟的建立使得欧洲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但由于欧盟仍然是个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外交上还远远没有达到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地步，英国作为欧洲传统大国，是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原苏联集团各国例如波兰、捷克等国对美国、欧盟的态度也是首鼠两端，并且欧洲的防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因此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可预见的将来，想要在政治上和美国平起平坐还不太可能，这自然会影响到欧盟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目前欧盟就是否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问题进行酝酿。美国对此必然会施加压力进行反对。因此最终结果如何可以看作是欧洲外交、防务是否独立于美国的一个试金石，也是中美欧三方实力在外交领域的展现。

和美欧相比，亚洲的情况显得更为复杂一些。一方面，亚洲潜力巨大，这里聚集了世界 60% 的人口，该数字在本世纪中期将达到 2 / 3。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亚洲的 GDP 在世

界 GDP 中所占的比例已从 1950 年的 19% 上升到 1998 年的 33%，到 2025 年将达到 55% 至 60%。而到 2002 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有 58% 掌握在亚洲国家手里，其中日本、中国分别占 19.3% 和 11.3%。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洲的整体经济力量已经和美欧不分上下，由于亚洲地区同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欧也是迟早的事情。但同时，亚洲力量却相当分散，除了东盟外，亚洲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经济联合体。另外，亚洲地区也是全球潜在冲突风险最高的地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中亚地区—克什米尔—中东地区都是潜在冲突的蛰伏地区。亚洲也是多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的汇集地，并且在有关历史问题上的见解也没有达成一致。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亚洲在一体化上面还有着相当大的障碍需要克服。

这样一种国际格局决定了：(1) 美国在本地区还存在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本地区在出口、安全保障等问题上均对美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依赖，在构建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洲金融合作问题上不得不顾及美国的态度，而欧洲在这方面的发言权则相对有限；(2) 亚洲力量的分散性和令人担忧的安全态势使得该地区在一体化过程中步履阑珊，但这还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该地区迄今为止无法找到类似美国那样的霸权力量，以及像法德轴心那样的支配性联盟，从而导致构建该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一点，我们将在对中国—亚洲地缘政治、经济的分析中予以详细讨论。

2) 中国的亚洲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1) 急剧变动中的亚洲秩序 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中。一方面，中国周边汇集了全球增长最强劲的国家地区，包括传统的四小龙以及新兴的东南亚小虎，具有深厚潜力的印度，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的日本以及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另外一方面，正因为该地区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处于经济起飞阶段，而日本显然由于种种原因限制而无法充当地区领袖的角色，这就造成了该地区处于缺乏霸权国家这样一个典型的霸权不稳定状态。而这一权力空白却由非本地区的美国来进行填充。

统计数字表明，亚洲主要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均取得了相当的发展速度，其中从 1995-2002 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印度分别以年均 8.4%、5.9% 和 5.5% 的成绩位列 3 甲。这种速度上的优势通过占世界总产出比例的上升反映出来。同期以 GDP 衡量的中国产出占世界总产出的比例从 2.4% 上升到 3.8%，印度从 1.2% 上升到 1.5%，而日本则从 17.9% 下降到 12.3%，东盟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则从 2.1% 下降到 1.8%。

从对统计数字的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有用的信息：(1) 中国、印度因为较高的

增长率，已经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相对中国、印度而言，日本和东盟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尤其是日本，由于 90 年代经济停滞不前，占世界产出的比重竟然下降了近 5 个百分点；(3)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在亚洲经济中位居前茅，其总量是中国的 3 倍有余；(4)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意味着亚洲的经济乃至政治版图将会继续发生大的变化和波动。如果各国经济组长继续保持目前的平均速度，那么在 2025-2030 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赶超日本位居亚洲第一，在 2060 年左右将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根据本文在第二节关于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分析，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必须在有霸权国家和支配性国家联盟，的前提下才能够建立起来，然而这两个条件在目前的亚洲并不具备：首先，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只有日本的 1/3，但日本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其综合影响力并不比中国更为强大，因此，可以认为该地区并不存在一个像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其次，在缺乏霸权国家的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像法德轴心那样的支配性国家联盟也希望渺茫，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和日本还有较大差距，且两国之间的互信和结盟的紧迫感远没有达到二战刚结束时法德那样的水平，且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相差甚远。而中日绕开任何一方而和其它国家之间建立支配性联盟关系可行性也较低。

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处于一种所谓的霸权空白区，在这段期间，任何建立整个地区性质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企图可以说都不会取得成功。只有到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从而使日本愿意和中国结成支配性国家联盟，或者中国经济总量大大超过日本，甚至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而成为亚洲霸主国家，一个亚洲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一判断，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至关重要。

(2)两岸三地(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从总量上来看，大陆、香港和台湾总产出占世界产出的比例从 1995 年的 3.8% 上升到 2002 年的 5.3%。已经接近日本经济总量的一半。两岸三地的经贸联系也不断增强，香港已经在考虑通过某种形式和大陆经济进一步联为一体(如正在评估中的粤港经济区)，而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也达数百亿美元之多，大陆更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从经济意义上来看，两岸三地的经贸往来对彼此之间形成更紧密的制度化合作关系提出了要求。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关系却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台湾当局已经决定在本年度 3 月 20 日举行所谓的和平公投，更是给两岸关系投下了阴影。

尽管如此，两岸三地的经贸合作乃至金融合作并不是不能有所作为，第一，两岸三地是真正的同文同种，在文化、历史上的关系比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紧密得多，如果不考虑

政治上的人为干扰，两岸三地是天然的经济一体化良场；(2)即使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政治上的杯葛，但台湾涉及几大强国之间的战略利益，不可能以弹丸之地挑战几大国际强权的战略利益，以台湾几个政客或党派的利益危及国际和平更是不会为国际强权所允许。这也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台独表示疑虑甚至反对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台独势力不可能也不应该对两岸之间的进一步经贸、金融合作造成大的损害；(3)即使台湾政客在有关统一问题上玩弄小动作，只要不触及大陆在对台湾关系白皮书中所提到的对台动武底线，大陆仍然应该一如既往地推动两岸的进一步经贸、金融合作。目前，两岸双边经贸合作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仅仅这种双向往来已经不能充分传达大陆在两岸关系上的诚意和善意，应该进一步提出将两岸经贸、金融合作制度化的提案(例如可以考虑把台湾也纳入“清迈倡议”的框架之中)，在两岸关系上向国际社会，也是向台湾当局和民众释放足够的信息。从而更好地把握主动权；(4)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应该积极发挥它的作用。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试验基地，保持了自己在政治上一定的独立性，由香港作为两岸三地的中间者和调解人应该比较合适的。一些合作方案，在适当的条件下，由香港提出并推动或许会更适当一些。

(3)中日韩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日本作为本地区最大的经济实体，对涉及本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均有发言权和一定的影响力，对充当地区经济事务领头人(例如建立日元区)的热情也从无到有，这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日本在地缘政治经济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于停滞、中国迎头赶上之势的压力日益明显的担忧所做出的紧迫之举。

日本对日元国际化的态度从80年代至今有了较大的转变，但转变的过程却比较缓慢。日本一直信奉传统的重商主义，更看重通过贸易上的顺差以及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占领市场，对建立一个日元圈的热情从一开始并不特别高涨。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的经济价值观转变的缓慢(菊地悠二，2002)，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盟国，对一切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举动都有所顾忌的政治考虑。

日本这种瞻前顾后的不决态度导致它在日元国际化的时机选择上犯了很大错误。正如在本文1.1.1节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不久的将来将至少在总量上与日本持平，并在此基础上赶超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顾即将发生的巨变而执意建立倾向日本的地区性政治、经济秩序的举动当然不会获得积极的回应和效果。日本建立日元区的最佳时机当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80年代，如今时机已逝，却在中国经济赶超之势日益明显之时提出不合时宜的提案，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日本的急迫感。近年来日本在有关地区合作问题上的举措要么不被国际强权所认可(例如1998年建立的亚洲基金的提案)，要

么屡屡落后中国(例如中国抢先和东盟宣布建立自由贸易区),这实际上反映了亚洲地区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强以及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加深,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大,2003 年日本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中国的出口来实现的,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开始扮演拯救日本经济的角色。果真如此的话,日本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加强与中国的进一步协调与合作,而不是幻想建立一个倾向日本的亚洲政治、经济秩序。这样的制度安排注定是不稳定而没有生命力的。最后,即使抛开中国因素,日本希望亚洲国家汇率建立盯住以日元为主的货币篮子提案也不可行,鉴于日元对美元汇率波动巨大,而美国又是本地区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在日元汇率稳定之前,类似的提案显然也没有任何吸引力。

对于韩国,中国已经成为它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日益加深,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韩国也要依赖中国的影响力和帮助。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时间里,韩国都是中国的盟友而非敌人。最重要的是,在亚洲经济竞争格局中,韩国不可能扮演像日本那样的作为竞争者的角色。因此,中韩合作的空间要更为广阔。因此,在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在不违背本国利益的前提下,可以根据需要而对韩国的一些倡议进行支持,同时,在 10+3 合作框架中,中国要尽量争取韩国对中国的支持。

(4)中国—东盟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在 9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必将成为区域性强权国家的事实,由于它们并不像日本那样具有大国野心,因此对中国的这种地位的态度也就更加客观。在这种认识下,东盟加快了和中国的合作步伐,通过了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扩展,东盟将会在有关问题上进一步倾听并尊重中国的意见,但为了保证东盟的利益,东盟国家将会进一步扩展 10+3 合作框架并尽力维持和本地区其它大国以及同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预见,在中国发展成为本地区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强国之前,东盟的这种合作之中兼顾平衡的对华态度将基本不变。

(5)中国—中亚—俄罗斯远东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无论如何不应该低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庞大的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对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需求将会有爆炸性的增长。预计中国今明两年的石油需求增长量将占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量的 1/3。而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计,到 2010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增加一倍,达到每天 400 万桶。到 2003 年,预计中国每天将进口 1000 万桶,相当于美国现在的石油进口量。这样中国的石油供需缺口将越来越大。

中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有一半来自中东地区，由于该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国的能源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中国必将加大保证石油供应来源多元化的努力。在这方面，中亚和俄罗斯远东是比较理想的供应渠道，这是因为：(1)从地理上看，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均与中国接壤，且均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密度相对稀少的地区，相对于其它地区(例如中东、南美、非洲等石油产区)，中国在发挥地缘政治经济影响上面具有相对优势；(2)目前各大国与中亚国家主要发展的是军事和政治关系，经贸联系发展相对较弱，这给中国留下了较大空间。为此，中国应该加大与该地区的经贸联系，在此过程中应该鼓励该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长期目标应该是使人民币成为该地区的储备货币，从而使中国能够最大限度地调用该地区的资源；(3)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应该奉行和中亚地区的相似战略，即鼓励边境交易用人民币进行结算；(4)考虑到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商品供应匮乏，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可以满足它们的需要。因此以上战略是可行的。

(6)中国—印度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尽管目前印度的经济实力远逊于中国，但从长远来看，印度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是亚洲地区和日本并列的两个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印两国边境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印两国大规模的经贸、金融合作也应该随之展开。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之间的合作所带来的战略利益应该大大超过中国—东盟合作所能带来的战略利益，这是由中印两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印度的发展潜力所决定的。在合作中，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外汇储备更多的优势，为印度的开放提供咨询和帮助，并打消印度在开放中对来自外部冲击所持有的疑虑。另外，从长远来看应该把中印两国之间的接近纳入整个亚洲经济、金融合作的框架中来，以体现亚洲未来新秩序的包容性和弹性。

(7)中国—美国—欧盟之间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

美国不属于亚洲地区，但美国超级大国的影响却遍及亚洲。美国同日本缔结了军事同盟，在东南亚、中亚设有军事基地，在太平洋、印度洋和波斯湾有舰队游弋。美国也是各亚洲国家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技术来源，美元是本地区的国际结算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华盛顿意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在亚洲各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美国的这种超级大国地位决定了它在本地区政治、经济事务中享有广泛的发言权，尤其在本地区缺乏霸权国家和支配性国家联盟的情况下，美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就越发明显。例如本地区最大经济实体日本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重构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为另一

方所失。这和欧元的诞生对美元国际强势货币地位形成挑战的道理是相同的。相对于日本而言，由于中国赶超美国的难度更大，因此在中短期内，矛盾将主要由中日之间的争夺而体现出来，但在长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开始赶超美国，这种争夺亚洲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多地在中美两国间进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证中美两国的和平竞争，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将是对中美两国执政者的一大考验。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对策上会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欧盟虽然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过美国，但在欧盟完成外交和防务一体化之前，欧盟在欧洲以外的影响力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并且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亚洲留给欧盟的空间也相对狭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将不会在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起到很大作用。但作为发达经济体，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美国技术和资金的替代品，另外，欧盟也可以向亚洲国家提供欧洲一体化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表 1 中国的发展阶段与经济实力矩阵

阶段	年份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短期	2003-2009	人均收入达到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中期	2010-2018		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中长期	2019-2027			经济总量赶上日本	
长期	2028-2067				经济总量赶上美国

注释：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在 1978-2002 年间年均增长 8.4%，这里按 7% 计算；中国的 GDP 增长率按 1995—2002 年的年均增长率 (7%) 计算；中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增长率按其在 1978—2002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分别为 1.3% 和 1.5%；日本的 GDP 增长率在 1995—2002 年间为负值，这里按对其潜在长期增长率的估计 2% 计算；美国的 GDP 增长率按 1995-2002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 3.4% 计算。这里各

数字均按 1995 年美元价格计算。

2、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背景

1) 中国未来改革发展各阶段的特点

到 2000 年底,中国 GDP 总量达到 89404 亿元,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经济总量比 1980 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的第二步。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从人均收入的世界对比来看,中国仍处于相当低的发展阶段。按 1995 年的国际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 GDP 在 1992 年以前一直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002 年人均 GDP 达到 941.94 美元,仍然低于中低收入国家 1318.16 美元,而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分别为 2079.78 美元和 29402.36 美元。显然,从人均收入水平上来看,中国仍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过渡阶段。

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典型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与发展来使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并超过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仍然是未来 5—10 年内的主题。在此期间,中国将主要致力于在解决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主要包括:

(1)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增长的成果更公平地为更多人所分享。这包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

(2) 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以为公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时,中国必将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企业和跨国集团;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也会大大增长,中国的海外利益开始凸现,对和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秩序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强烈。在这一阶段,中国应该考虑采取切实的步骤去塑造一个符合自身要求且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的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

2) 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交互作用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里的发展与国际实力地位的相互关系的判断矩阵,如表 1 所示:

在表 1 中,我们将 2003—2009 年划分为短期,在该时期期末,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并超过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一时期也是国内改革的关键时期,多年积累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视该期间内国内改革和发展政策的科学性与公平性;

2010—2018 年为中期,在该期期末,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并超过中等收入国家

的平均水平。在这一时期，中国将基本完成国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其在亚洲新兴强权的地位也日益明显，并将同日本展开争当亚洲领袖的角色；

2019-2027 年为中长期，在该期期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并超过日本，其亚洲第一强国的地位将得到确认并在随后继续得到巩固，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竞争并且不确定性最强的时期；

2028-2067 年为长期，在该期期末，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并超过美国。这期间，新的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将确立。

在这段时期中，如果中国不和国际强权发生武装冲突，则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

表 1 也将成为我们对中国—亚洲金融合作阶段性划分及在其中发挥作用与相应对策的依据。

3、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原则、作用与对策

1) 原则

根据第二节中对国际秩序稳定性分析，并本节对中国发展阶段的划分，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中应至少把握住以下原则：

(1) 未来的亚洲金融合作应该充分考虑亚洲经济、政治格局将发生的变化，即充分考虑亚洲新兴国家未来的成长趋势，以使亚洲金融合作框架拥有足够的弹性反映变化中的力量对比；

(2) 中国参加亚洲金融合作应与中国在各个时期（见表 1）的发展阶段与国际实力相匹配，以不损害长期内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底线；

(3) 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短期内中国的利益不能受到损失，长期内则要在争取共赢局面的同时获得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政治、经济收益。

(4) 在亚洲金融合作中要充分考虑不同时期国际强权的反应，最大限度地争取统一战线，以保障中国的和平崛起。

2) 作用和对策

在短期内(2003-2009 年)，中国仍然属于低收入水平国家，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深化国内改革与发展。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应体现在完善现有金融合作安排，落实已达成的各项金融、贸易协定，进一步紧密同东盟以及其它亚洲重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该阶段可以考虑进一步推动两岸三地的贸易、金融联系；与此同时尊重现行国际秩序；

在中期内(2010-2018 年)，此时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也应该在亚洲

和世界舞台上更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是：(1)在全面落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同时,可以通过向其它亚洲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以加强同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之间的经贸联系,集中精力推动亚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为进一步发展金融合作打下基础；(2)利用两岸三地的联合优势,在大中华经济圈筹建区域金融中心,发展地区金融市场,并优先鼓励人民币在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使用；(3)应尽量争取日本与中国的联合,说服日本放弃建立日元区的企图,转而构建包括人民币和日元在内的亚洲一揽子货币篮子,作为未来亚洲货币的发行基础；(4)在这一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东盟国家和韩国的利益,同时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将印度也拉进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建设过程。总之,这一阶段将成为决定亚洲金融合作未来走向和成效的关键阶段。

在中长期内(2019-2027年),中国将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实体,新的亚洲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在这一阶段完成重构过程,为此中国的作用应该体现在：(1)应该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的发动机和领头羊,为亚洲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提供市场和动力,推动亚洲经济、金融一体化进程；(2)应该使人民币或者以人民币为主要权重的亚洲货币成为亚洲国家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单位；

在长期内(2028-2067年),中国将赶超并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此时中国的作用范围应该超越了亚洲区域范围,而在全球框架下谋求改革原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使国际格局反映全球实力对比的新变化。

从2004-2067年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其间世界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并不为人所晓,但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规划与设想,中国在这段时间内至少应当采取如下策略,以保证中国在每一阶段的战略利益：

(1)符合地缘政治、经济的要求,首要完善并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两岸三地的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稳定同美国、日本的关系。

(2)应该充分吸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和欧洲货币一体化相对成功的历史经验。历史经验表明,从长远来看,集体联盟要比单个霸权国家支配下的国际秩序更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将低于日本和美国,以人均收入水平来看更是将长期处于相对较低阶段,因此,在金融合作中应该充分联合本地区大国,争取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以建立起类似法德轴心的支配性国家联盟；

(3)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经验还表明,一个开放、稳定的市场要比单一的金融一体化更加重要,没有前者,后者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应该在亚洲金融合作中提倡优先完成贸易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在这一基础之上完善金融合作。

参考文献：

(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时运变迁：美元和日元国际地位的变化》(中文版)，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p10-20；

(日)菊地悠二：《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展望》(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P167-18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

例如，按算术平均值计算，1955—1970 年间美国 GDP 增长率为 6.5%，低于日本的 15.2%，德国的 10.6%和法国的 7.5%。

由于台湾是 2000 年数字，因此 2002 年的两岸三地产出份额应该更大。

《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急剧上升》，日本《日本时报》5 月 17 日，《参考资料》2004 年 5 月 21 日转载。

(本文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4 年第 4 期)
(扫校：时国英)